

【经济思想史】

政治经济学在思想史中的嬗变

——政治、经济、心理由分化向融合的复归

高 岭 卢 荻

【摘 要】本文以政治、经济、心理的分化和融合为主线,对政治经济学的三次嬗变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评述。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嬗变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第二次嬗变产生了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向行为科学的转型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次嬗变,产生了行为政治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用社会人假设代替经济人假设,代表了未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人假设

【作者简介】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经济学家》(成都),2018.10.56~62

【基金项目】基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与时俱进。理解政治经济学在思想史中的嬗变过程,是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没有哪个术语像“政治经济学”一样“变化多端”。“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实施了“去政治化”、“去心理化”^①运动。这两种运动相互交织、强化,最终“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推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开始认识到,经济和政治在本质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正是他们促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次嬗变——政治、经济融合,“新政治经济学”^②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和繁荣,心理学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这次嬗变的结果是“行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现有文献对政治经济学演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评述,如方福前(1999)^③、程恩富和王小文(2003)^④、陈振明和黄新华(2004)^⑤、张林(2017)^⑥,等等。虽然马春文(2005)^⑦、蔡继明和王成伟(2012)^⑧、莫西·贝斯利(2012)^⑨、时家贤和武巍(2013)^⑩

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但仍是以政治、经济的分化与融合为主线,忽视了心理学的位置以及行为政治经济学这一最新理论进展。本文第一次以政治、经济、心理的分化与融合为主线,透过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三次嬗变^③,以期推进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演进过程和最新前沿的认识。

一、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嬗变——分化

社会科学最初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即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全部^⑪。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朴素著作,以色诺芬的《经济论》为代表^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超越狭隘的家庭或庄园,延伸至整个国家或城邦的标志是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与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著作,^⑬但正如熊彼特所说,“该书是平庸之作,毫无创见。”^⑭马克思也认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不是蒙克莱田,而是后来的威廉·配第^⑮。“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都做了最初的勇敢尝试。”^⑯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始终是政治家如何

更好地管理国家的经济事务,以使公民的需求得到满足。^[14]政治经济学被斯密看作是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15]有学者据此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学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16]其实,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关注政治活动,还关注行为心理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道德情操论》。^[16]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是政治、经济、心理的统一^⑤。自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逐渐狭隘化(马克思除外),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的讨论囿于政治活动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李嘉图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斯密的经济学说,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但丢掉了斯密根据“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来分析经济现象的传统。^⑥在方法论上,李嘉图偏好“根据先验公理进行抽象推理的技术”、“逻辑的一数学的而不是哲学的、历史理论的”^[17]实证方法,不自觉地使政治经济学向自然科学趋近。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转向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经济在原则上是与政治和家庭生活分离的体系,经济不是政治性的。^[16]从此,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倾向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性质认识和解构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旨在发现经济规律,而政治是规范的艺术,是一组规则,因而“政治”应该从政治经济学中清除出去。^⑦西尼尔干脆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纯经济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四条公理:“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人口原理”、“工业生产力原理”和“农业报酬递减原理”。在西尼尔看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规律都可以从这四条公理演绎中得到。熊彼特甚至认为“作为纯理论方面的尝试,他(西尼尔)的成就显然在李嘉图之上。”^[18]

如果说西尼尔进一步发挥了李嘉图的逻辑的一数学的演绎法,萨伊则进一步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科学”与“艺术”、“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化。^[19]政治经济学自此在“去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过“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拾起并发展了古典理论的一个实为糟粕的创新

——经济与政治的二分法。^[20]经济学和政治学各自研究各自的问题,要求经济学和政治学在研究对象上有一个明确的界线。然而,正如克拉克所说,虽然经济、政治这两个术语一直被广泛使用,但学界对两者却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界定。克拉克试图用“三维度法”^⑧划分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学、政治学在以上“三个维度”存在交叉、重叠。^[9]这潜在地表明经济学、政治学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经济的、政治的二分法实质是一种人为的粗暴的强制。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无视经济、政治二分法的局限,“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即个人化理性主体选择及其均衡,来定义学科的特质。”^[21]按照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22]如果说罗宾斯的贡献是为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了规范而统一的研究对象,萨缪尔森的贡献则在于为这个研究对象提供了严谨的分析工具,萨缪尔森为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建立了数学基础,也为理性行动或选择理论奠定了方法与理论的基础。^[23]萨缪尔森开启的经济学数学化范式固然极大地推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即凡是不能数学化的东西要么作外生化假设处理,要么直接抽象掉,其结果是“理性选择论点,到目前为止,都被窄化而限于研究社会性孤立的个人与经济目标。”^[23]在这个“低度社会化”^⑨的图景中,“权威政治完全无益于自由市场竞争。”^[23]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市场过程时通常把政治关系排除在外。政治过程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只是因为市场失灵的出现。卡波拉索和莱文认为,新古典分析法的局限性之一就是“把政治过程或国家理解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14]凯恩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质疑,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重新界定了政治权威的作用。但是,凯恩斯把政府的作用从矫正市场失灵扩展到矫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失灵,仍然是以功能主义看待政治权威,因而并没有真正把政治过程引入经济过程。可见,从李嘉图以降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除外)到整个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的都是“去政治化”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次嬗变——融合

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催生了政府干预主义。就在这个时候,布坎南对流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提出了质疑。布坎南认为,盛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和马歇尔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价格理论,并且是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要理解市场过程,进而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正是隐藏在被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而,在布坎南看来,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原来位置的复归。布坎南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传统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复归,但这种复归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因而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布坎南拓展了“市场”的外延,把市场的外延从经济市场扩展至政治市场。布坎南对政治市场的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隐藏在被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政府”是斯密意义上的“有限型政府”,而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扩张型政府”;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布坎南提出了三个重要假设:(1)方法论的个人主义;(2)“政治人假设”,布坎南认为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政治家;(3)“政治交易市场”假设,布坎南把经济市场的交易行为拓展到政治市场,形成了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框架。^①

虽然斯密敏锐地意识到有效政府的概念必然要解决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②,但他始终没有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而是把政府的激励问题、支撑市场机制的政治制度问题作了外生化处理。布坎南试图弥补这个不足。在政府的激励问题上,布坎南认为政府和个人一样具有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前者甚至更强烈。为遏制政府以权谋私,布坎南提出用宪政作为政府自利倾向的约束机制。虽然对政府的自利倾向的约束诉诸于政治制度几乎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共识,但在具体的约束机制的设计上,新政治经济学内部并未达成共识。麦迪逊认为约束政府自利的机制可通过选任“品德高尚者”实现^③,而布坎南却认为改善政府治理的效率的关键,并不在于“选任那

些利用权力谋求公共利益的道德高尚者”^④,而在于用法制即宪政约束公权力。麦迪逊和布坎南在政府治理问题上的分歧,实际折射的是国家理念的差异。政府的善恶之争始于古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政府就被塑造为仁慈的君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一步阐释了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政治哲学的另一研究进路是从人性出发,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的善与恶在政治中都有所体现。此后的休谟、霍布斯、洛克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传统,假设了为追求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政府出现的可能性,即休谟的“无赖之徒”假说。^⑤在政府治理理论演进过程中,“仁慈君主”假说和“无赖之徒”假说代表了两种分析范式,前者曾一度占据主导。布坎南和塔洛克对政治市场的研究逆转了经济学研究对政府行为动机的认知,“无赖之徒”假说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建立在这个假说之上的“宪政经济学”也日益流行开来。这进而挑战了正统福利经济学,因为后者诉诸某个权威机构(作为社会偏好的监护人)充当资源配置公正的仲裁人。^⑥

很多人批评布坎南把经济市场的交易原则运用到政治市场,忽视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存在异质性。其实,布坎南非常清楚地知道,经济市场的货币媒介和政治市场的权力媒介不同,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市场选民的“自愿主义原则”同经济市场的“自由市场原理”是一致的,因而经济市场的交换原则可以运用到政治市场的交易原则。^⑦如果说布坎南的研究侧重于政府的内生性,即政府是如何产生的,塔洛克的研究则侧重于政治、经济互动中的政府行为。塔洛克遵循布坎南提出的三大假设,建构了官僚政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经济租”。经济市场中的竞争主体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通常会染指政治市场,向政府寻租。在塔洛克的研究中,政府是被“讨好”的对象。而唐斯研究了“讨好”的另一种情况——政党“讨好”选民。唐斯的投票模型表明,如果竞选的政党只在乎输赢,那么他们的竞选纲领会倾向于向中间选民靠拢。唐斯模型对后来的选举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引来不少质疑,比如孔多塞悖论。^⑧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NPE¹)是相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那么,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则是相对于NPE¹而言,是第二代新政治经济学(NPE²)。第二代新政治经济学的突破性进展在于提出并运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政治过程,这个工作主要由阿西莫格鲁和拉丰完成。自布坎南提出并初步探索了宪政设计思想以来,宪政的制度设计理论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主要集中于政治优待的需求侧的研究,即利益集团互相竞争,竞相要求得到政府的政治优待。在政治优待的供给侧,即政治家和选民为何以及如何提供这些优待,一直没有出现相关的模型,从而政治体系是如何将施压集团的行动转化为政治影响的等政治优待的供给机制就成了一个“黑箱”。为打开这个黑箱,拉丰在贝克尔的研究基础上引入了信息约束,并基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设计了完备的和不完备的宪政设计,它不仅形塑民众选举政治家的代理机制,还规约政府的结构。^[25]总之,拉丰的委托代理政治模型把宪政制度设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阿西莫格鲁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概括为四种类型:渐进的、稳固的民主化道路(典型代表是英国),反复的、不稳固的民主化道路(典型代表是阿根廷),持续的相对平等和繁荣的专制道路(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以及持续的极端不平等和充满剥削的专制道路(典型代表是种族隔离政权瓦解前的南非)。^[26]面对这四种典型事实,阿西莫格鲁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进行解释,方法是先用“奥卡姆剃刀”对复杂的民主化进程进行简化和抽象,把社会群体抽象为两个对立的阶层(阶级或集团):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⑧阿西莫格鲁运用博弈论把专制向民主的过渡即民主化问题置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利益分配冲突的框架之中。

基于个体理性的策略行动、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维系政策承诺可信的政治制度是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框架的三个核心要素。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民主还是专制取决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博弈,是精英阶层在让渡(部分)权力与镇压成本之间权衡和妥协的产物,民主是精英阶层为避免平民革命或

政变的可信承诺。在操作和应用层面,阿西莫格鲁把影响民主化的因素量化为7个:市民社会的发展程度、震荡和危机、精英阶级的收入来源和财富构成、适度约束精英权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不平等程度、中产阶级的数量以及全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亨廷顿退却”的超越。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需要27个因素及其组合才能解释,但这些因素的组合会因国家、发展阶段和世界浪潮的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存在能解释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一般化理论和一般化的分析框架。^[27]亨廷顿对民主化的一般化理论和分析框架探索的“放弃”,在政治学文献中被称为“亨廷顿退却”。^⑨

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次嬗变——心理学的复归

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化的过程同时是“去政治化”和“去心理化”^⑩的过程。“去心理化”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一,在约翰·穆勒片面地把斯密对人的本性中的自利的一面形式化为理性人假说后,新古典革命进一步把理性人假说抽象化、形式化和非人格化。^[28]这种处理实际是把人的本质视为理性的、自利的这样一种抽象物。新古典主义的机械的认识论先验地认定这种抽象物是对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完美的抽象和概括,因而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第二,在边际革命发生的19世纪,心理学本身不成熟,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支撑。第三,伴随边际革命而来的实证主义思潮,使得经济学家希望把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对心理学的不满日益增加。以上三种因素促使新古典经济学发动了摒弃心理学的运动。^[28]

然而,经历了19世纪的雏形期,心理学从20世纪初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推进了人们对人内在的生理机能与外在的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的认识,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为行为经济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正是这个反思的过程复辟了心理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位置。经过大量观察和实验,心理学家发现理性人假设严重违背现实,并指出人的大脑存在两个认知系统:系统1和系统2。行为经济学通常把卡尼曼的双系统称为“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前者来自人的情感反应,后者来自

有意识的思维。正是在这两个认知系统的相互作用下,现实中的人不是新古典世界中的理性人,而是社会人。社会人有三个核心特征:有限理性、缺乏自我控制和从众效应。^[29]行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摆脱了边缘化的状态。^[30]行为经济学主流化的过程中,对金融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法学、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学亦呈现出向行为政治经济学转型的趋势。

其实,作为政治经济学第二次嬗变的产物,新政治经济学已经意识到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拉丰用不完全契约方法研究宪政设计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现实中的理性总是有限的。”^[25]但仅考虑有限理性是不够的,现实中的行为人除了理性有限外,还缺乏自我控制和存在从众效应,后者几乎被新政治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即使单就有限理性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处理也是一种简化处理,把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等同。对于真实的有限理性,经济学很难将其数量化、模型化,这也是西蒙早在1955年就提出“有限理性”,但长期停留在概念的层面,极少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应用的原因所在。^[28]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个难题终被克服。实验的方法,尤其是行为博弈实验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目前,行为博弈论已经被应用于政治家候选人对施政纲领的选择以及国会行为^[28],这标志着行为政治经济学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自1995年开始,塞勒致力于自由专制主义[®]与助推策略的研究。自由专制主义突出了助推的核心思想:助推旨在影响人们做出对其有益的选择但并不强制人们必须接受或做出某个选择,最终的选择权在人们自己手里。助推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人假设,正因为理性的有限性、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以及存在从众效应,人们经常会做出“错误”的行为。为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塞勒提出了“助推”计划。“助推”旨在帮助人们在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之间寻求平衡,以克服偏见和谬误。助推策略已广泛应用于医院、学校、机场等公共领域,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开展,创新政府行为是行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沿。

与新政治经济学相比,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政府

行为的研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征:一是对选民的认识,新政治经济学把选民当聪明的理性人看待,行为政治经济学则把选民当普通的社会人看待;二是对政府的认识,新政治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人,所以其研究的焦点是通过制度设计约束政府滥用权力,而对行为政治经济学来说,政府的动机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设计者如何有效地为选民提供选择体系,“在这种选择体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通过强制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去改变人们的选择或者改变他们的经济动机及行为。”^[29]对于新政治经济学(其实是所有自由主义者)的担忧:担心政府部门的竞争力或亲和力不够,担心政府部门选举出来的官员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私人组织等,行为政治经济学并不回避。社会人的行为无疑会受个人动机影响,但同样会受到“助推”[®]的影响。只要“助推”是有章可循的,有些政府部门犯错误、搞偏见的行为就能得到纠正。

在现实中,政府部门时刻都在基于自己的政策对一些人的选择施加影响。如果政府的命令和禁止能够被鼓励和助推取代,政府部门将会精简得多、干练得多。^[29]研究表明,政治选民的决策和行为主要依赖于直觉思维系统,因而试图通过复杂的说理和统计数字阐明自己观点的政治家候选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局面,甚至选民仅仅看候选人的照片就能准确预测谁最具竞争力。[®]这充分说明新政治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说构建的投票模型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注意到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与其掌握的信息有关^[31],公众不信任政府有时并不是因为政府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公众不关心社会事务和公共政策,是不了解政府政策的产物,将会发现“助推”对改善政府的工作方式和重塑政府形象方面有多么重要。“助推”策略自2008年提出以来,受到了很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成立“行为洞察力小组”,以期用行为科学的方法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四、结语

政治经济学从其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三次嬗变,第一次嬗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嬗变,这个嬗变过程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去政治化”、“去心理化”的过程,是政治、经济、心理由统一到分化的过程。当政治学和经济学由于“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32]政治经济学发生了第二次嬗变,这个过程是政治、经济由分化到融合的过程,心理学仍被排除在外,由此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仍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根本假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心理学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政治经济学向行为科学的转型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次嬗变——行为政治经济学。

行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据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报告,全球共有136个国家将行为科学融入其公共决策,有51个国家制定的中央政策受到了行为科学的影响。^[30]行为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的政府治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马克思早就指出“官僚政治是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31]虽然官僚制是一种特别不负责任的政治管理形式^[34],但消灭官僚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35]我们目前还不具备消灭官僚制的条件。不过,我们可以借鉴行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利用助推策略创新政府行为,遏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注释:

①新古典经济学家清除心理学的运动细节,可参考贺京同:《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行为》,第23页及注释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②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是指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③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过程的分析,省略的这部分,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

④根据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这个论断并不成立,因为中国古代的管仲比色诺芬更早地探讨了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详情可参考:张宇、谢富胜、刘凤仪:《中级政治经济学》,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⑤如果注意到中世纪的“经院学说”的特色,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道德等诸多

学科的综合体。

⑥严格说,整个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都和心理学无关。可参阅:周业安:《19世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第50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⑦亨利·西奇威克在1936年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撰写政治经济学词条时,仍然按照科学与艺术的二分法解读政治经济学,可参阅: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第54页,《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⑧“三个维度”分别是行为、行为追求的主要目标、行为借以实现其目标的组织或制度形式。

⑨关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具体分析,可参阅:G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⑩根据汪丁丁的研究,这三个假设并不是布坎南的原创,创始人是北欧学派的维克塞尔,布坎南承接了维克塞尔的思想。布坎南本人也承认他一生的主要工作都是在阐发维克塞尔的三大假设。可参考:汪丁丁:《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⑪详情可参阅:黎敏:《除魅的政治、理性化的政治与宪法政治》,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

⑫汪丁丁(2004)对这个问题早就作了澄清,但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可参考汪丁丁:《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⑬随着研究的深入,阿西莫格鲁引入了介于精英阶级和平民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类似于马克思的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在平衡精英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利益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走向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

⑭可参阅方绍伟:《民主与专制的制度起源》,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77.html>.

⑮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新古典边际革命的效用价值论的建立和发展与心理学并没有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以主观价值论为核心,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心理学基础。可参阅:周业安:《19世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⑯也译为自由家长主义,自由专制主义挑战和超越了传统上对“自由”和“专制”构成对立关系的认知。自塞勒和其团队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就招致不少质疑和批评,但整体上人们正在接受它。

⑰根据塞勒的定义,任何能够显著改变社会人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助推”。

⑱详情可参考:塞勒、桑斯坦:《助推》,刘宁译,第20-21

页及其注释1和2,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 [1]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9,(3):33-39.
- [2]程恩富,王小文.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学革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1):158-170.
- [3]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4-23.
- [4]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58-71.
- [5]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3):52-58.
- [6]蔡继明,王成伟.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J].经济学家,2012,(9):5-12.
- [7]莫西·贝斯利.新政治经济学[J].比较,2012,(3):1-24.
- [8]时家贤,武巍.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J].江汉论坛,2013,(3):47-51.
- [9]BARRY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M]. Second Edition.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8.
- [10]张宇,谢富胜,刘凤仪.中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
-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4.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詹姆士·A.卡波拉索,戴维·P.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M].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1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16]周业安.19世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6):49-56.
- [17]PHYLLIS DEAN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16.
- [20]高岭.两种不同分析范式的资源配置论[J].税务与经济,2017,(1):9-15.
- [21]卢获.全球化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论效率、效率体制和后进发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4):55-72.
- [22]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3]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24]BUCHANAN. The Public-Choice Perspective: In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25]拉丰.激励与政治经济学[M].刘冠群,杨小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6]阿西莫格鲁,罗宾逊.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M].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27]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 [28]贺京同.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行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 [29]塞勒,桑斯坦.助推[M].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 [30]塞勒.“错误”的行为[M].王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31]KUZIEMKO et al.. How Elastic Are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 (4): 1478-1508.
- [32]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
-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01-303.
- [34]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00.
- [35]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孟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15.